

加大力度推进当代中国艺术国际交流

吴为山

潮音阁

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和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华文化的发展必须融入世界文明浩浩荡荡的洪流之中。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软实力自然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文化实力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而当代中国的艺术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表情,艺术是社会状态的寒暑表,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综合体现,是当代中国现实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帮助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的最佳载体。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力度推动当代中国艺术,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艺术成果走向世界,这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中国艺术由“旧时王谢堂前燕”走向了广阔的国际舞台,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国际交流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隐患:首先,我们“走出去”的艺术文化产品偏重于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的传播力度、广度、深度则远远不够。国外民众常常通过三星堆、兵马俑以及中国古代画卷、书法来了解中国,而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却严重匮乏或者偏颇、误解。

那些在西方当代主义意识下产生的扭曲领导形象、丑化中国人面貌的作品堂而皇之陈列于外国艺术殿堂。恰恰相反,不少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只能在一般画廊展示,文化的尊严被严重损伤。其次,我们始终处于“被选择”的状态,大规模的艺术生产与消费并没有确立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艺术话语权,当今的国际艺术规则与标准仍是西方一统天下。中国艺术品获得西方关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其中也充满着“被看”的危险。倘若我们不能确立中国立场,仅仅因袭摹仿西方的前卫艺术,那么就会与中国文化内部深厚的传统底蕴发生断裂。再次,目前中国很多当代艺术品在国际市场的走势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同时还较多地受到了盈利策略的驱使。艺术家往往被误导,似乎只要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就可以在短时间里扬名世界。艺术家对国际资源的信息了解不够全面,只能以个人名义与海外画廊或其他艺术机构合作,推向市场的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因为以上的种种不足,导致当代中国艺术被过分政治波普化,“文革”意识或“文革”产生的作品被视为主流,某些畸形表现、格调低下、哗众取宠的艺术家得到热捧,使得世界一再“误读”中国。

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文化艺术上的简单参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就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所追求的目标。2012年秋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一件关于孔子的当代雕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这件雕塑作品蕴含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全人类的灵魂。”同年11月,当意大利文化部长见到中国雕塑家创作的《老子出关》时,激动地说:“透过这件作品可以看到中国前进的步伐。”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只有真正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有效地宣传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艺术才能真正在国际交流中获得长久的认可与尊重。

鉴于上述状况,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构价值标准体系是中国艺术品走向国际的过程中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坚持多元、开放、创作自由的前提下,要提高对文化艺术品主动输出和筛选标准,形成健康发展和谐生成的中国当代艺术评定机制。在筛选中应当把握3个原则,即健康高尚的思想、普世的情感和高水准的艺术性。
二、实施“中国当代艺术推

广计划”。有步骤地将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价值观、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中国优秀艺术作品推向国际舞台,培育具有较强实力的中国文化走出去,逐步拓展中国艺术产品的国际市场。
三、加强官方机构、正规艺术品经营机构和主流媒体的互动,形成良好的艺术品输出机制。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是隶属于文化部的两大艺术机构,那里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文艺理论专家,应当充分发挥他们在当代中国艺术国际交流中的引领作用。
四、组织海外考察,进一步加强对对外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同时培养孕育一批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够与西方接轨的艺术经纪机构,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艺术体系,使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建构全球话语权的过程中得到最为有力的支撑。
五、发现并培育品牌级的艺术家。一个国家的文化复兴离不开艺术巨匠,只有在国际舞台上对一流的艺术家进行全方位推介,才能有效地树立起国家的文化形象。西班牙政府曾以重金聘请毕加索为纪念西班牙内战创作绘画,由此催生了享誉世界的名作《格尔尼卡》;英国政府曾委托亨利·摩尔担任“战时官方艺术家”,亨利·摩尔利用这一机会创作了著名的《防空洞素描》,历史性目标。2012年秋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一件关于孔子的当代雕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这件雕塑作品蕴含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全人类的灵魂。”同年11月,当意大利文化部长见到中国雕塑家创作的《老子出关》时,激动地说:“透过这件作品可以看到中国前进的步伐。”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只有真正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有效地宣传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艺术才能真正在国际交流中获得长久的认可与尊重。

鉴于上述状况,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构价值标准体系是中国艺术品走向国际的过程中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坚持多元、开放、创作自由的前提下,要提高对文化艺术品主动输出和筛选标准,形成健康发展和谐生成的中国当代艺术评定机制。在筛选中应当把握3个原则,即健康高尚的思想、普世的情感和高水准的艺术性。
二、实施“中国当代艺术推

“新汉学”与东西方对话

陈 珏

“新汉学”缘起

“新汉学”是近年大家谈得很多的一个名词,去年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一个非常重要话题就是“新汉学”。“新汉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这样一个新概念正在形成中,所以人们有不同的说法。追根溯源,大概是2010年前后,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场合,被不约而同地提出。当时便有不同看法,今天更是如此。然而,无论哪一种,即使它看来不一定可能,我们也应该试着通过实施对话来考察其可能性,坚持在不可能之中,体验这个不可能,尝试这个不可能。这些意见都非常精彩,展示了“新汉学”与东西方的对话,在今天呈现出非常复杂多元的状况。笔者也是在3年前,进入“新

汉学”领域研究行列的,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风格比较重实证,起点便是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百年清华史与汉学史的关系源远流长。当年赫赫有名的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便与法国汉学、美国汉学、德国汉学、日本汉学的关系很紧密。此后数十年,清华师生出现过许多国际汉学界知名的人物,不胜枚举,有目共睹。时至2009年台湾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共同筹备2011年百年校庆,为促进两校同仁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密切合作,合力推出两岸清华合作研究基金,每年编列等量经费,由两岸清华学者自主主题,选择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各领域中前沿问题,共同提出申请,展开研究。拜清华源远流长的汉学研究传统之赐,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成为两校首批各自核定的24件合作计划中为数不多的计划之一,执行期从2010年1月到2011年12月,由笔者和时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张闻刚教授共同主持。两

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的成功实施,使两校学者有了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意愿,从今年1月开始,延续3年的新的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便应运而生。

“新汉学”与比较文学

如上所述,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已经完成的部分是“汉学的典范转移”,而未来3年的重点议题则为“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可以说是“新汉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笔者曾提出:汉学与中西比较文学这两大学科,都是东西方对话的一种,并互相包容。往往在汉学界看来,比较文学是汉学的一部分,而在比较文学界看来,汉学则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

笔者曾提出:百年清华不仅有源远流长的汉学研究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出身清华的闻一多、吴宓、柳无忌、钱锺书诸公,哪一位不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先的人物?如今之两岸清华,不约而同,追随早期清华的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传统,既成绩斐然,又各有侧重,分别列台湾与大陆之前茅。由此可见,两岸清华在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路途中,以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为架构,在汉学研究与比较文学领域进一步携手合作,面对国际文科领域兴起的跨学科研究热潮,

是共创双赢的应有之义,不可或缺。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作为前列的“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的接力性扩展,计划以三年时间,将汉学与比较文学这两岸清华的传统强项联结成一体,继续开来。

其中的一个举措,为规划两岸清华联合召开“孟而康的遗产——比较文学与新汉学的跨世纪视野”国际研讨会(暂定名)。从“新汉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杜希德与孟而康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杜希德是20世纪“汉学的典范转移”中的关键人物,而孟而康与钱锺书则是在30年前联袂推动太平洋两岸的比较文学和“新汉学”发展的先驱,其贡献具有划时代的破冰意义,在西方闻名遐迩,然而这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在汉学和东西方比较文学中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却鲜为中文世界所知。

两岸清华新计划中规划的“孟而康的遗产——比较文学与新汉学的跨世纪视野”国际研讨会,无论从比较文学角度,还是从新汉学角度,都将是一次继续开来的会议,寻找联结两者的内在纽带,预期也将能激起同样强烈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东西方对话中的“新汉学”

笔者关注“新汉学”的提法和研究“新汉学”学理的构想时,经

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新汉学”究竟该怎样定义?笔者认为:“新汉学”如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目前还不知道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是一个目前完全不能界定,也不需要界定的概念。未来的15到20年,将是“新汉学”渐生渐长,逐步自我界定的关键期。

这个关键期中的重点,是在东西方的创造性对话中,展示“新汉学”学理中潜藏的方方面面,亦即东西方的创造性对话,是“新汉学”未来的自我界定过程的重要一环。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过去两年在台北、北京、上海、京都所举办的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便是旨在从高端层面入手,透过东西方的创造性对话,摸索“新汉学”的学理。两年来,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在上述活动中邀请对话的学者先后数十人:哈佛大学特级教授宇文所安、牛津大学文学史讲座教授柯律格、剑桥大学文学史讲座教授麦大维、普林斯顿大学铃木大拙佛学讲座教授太史文、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康达维、海德堡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雷德侯、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叶翰、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户仓英美、京都大学敦煌学教授高田时雄等,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学勤和张闻刚、北京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等。

笔者近期连续在报刊撰文,作如下展望: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新汉学”在其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才能完成它的型塑过程。在学术界达成真正的共识。为提供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讨论平台,在以上国际活动的基础上,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当仁不让,参与创办了“金董会”和“新汉学”全球论坛,推动设立促进东西方对话的汉学交流圈。“金董会”的功能是“请进来”,而“新汉学”全球论坛的功能则是“走出去”,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明年拟开始与欧美亚有汉学研究传统的名校合作,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新汉学”论坛,让中文世界的学者走出去,对话国际学术界,以演化成一个个名副其实的全球论坛。(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专书约五十种,在汉学界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

观点摘编

创新离我们还有多远

当前中国大力倡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反观现实,成就巨大但差距明显,瓶颈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我们的创新为什么进入到一个知易行难的阶段了呢?从根子上说,是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社会文化。

大兴创新文化建设须在三方面下功夫:营造浓厚社会风气,发展各种推动创新的实体组织,培育人们深入内心的创新心理与精神。首先要为创新营造一个浓厚的社会风气,风气的形成关键在舆论导向,重复重复再重复,创新被宣传一千次就成了社会共识与风气,那时候全社会弥漫一种热爱创新、创新光荣的风气,一看便知创新文化基本告成。其次要积极鼓励发展各种以创新为宗旨的实体组织。比如,直接从事创新研发活动的,培育开发创

新人才的,生产经营创新产品的,集聚各类创新要素的,宣传推广创新文化的,诸如此类的公司、企业、机构、团体等都在大兴之列。最后要让创新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成为一种自觉的心理与行为。这一点的关键在教育。改革现行的打孩子一出生就灌输服从听话式的教育理念,千篇一律甚至因循守旧的教育内容、应试主导答案标准化唯一化的教育方法,是当务之急。可以想象,当人人内心都涌动一股子创新冲动、创新激情,创新成为人们内心一种朴素的情愫并上升为一种价值观时,创新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应该说已经臻于完善、步入高境界了。

——于新东:《创新离我们还有多远》(摘自2013年3月4日《学习时报》)



写不尽的文艺作品话题——

正义与邪恶如何评判

周玉宁

很多影视作品都在反复表现一个主题,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好人赢得好运。这样的主题表达的是人类一种普遍心理诉求,好人应该有好报,英雄应该有好运,正义应该永远远扬。而在现实的层面,很多时候正义战胜邪恶也应是常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可能有些曲折,也不乏时有挫折,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

社会的正面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价值参照。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心中很有正义感,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人心中的价值参照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善意的。只是,人类心灵探索的深度,很多时候正义战胜邪恶也应是常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可能有些曲折,也不乏时有挫折,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

正义的做法或概念其实未必就没有合理的因素。正义的定义本身就有着某种权力因素和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某些荒谬的做法被作为国家权力推出之始,也是被当做正义力量看待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正义的定义其实是有难度的,也是有局限的,这就是正义定义的时代性。比如,片面追求 GDP 时代,我们追求了造纸厂的一卷卷白纸,而没有看到一片片被砍伐的森林和一个个被污染的河湖。以文艺创作来说,当年对人性至纯至高追求时所塑造的一个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今天看来未必不是一种荒唐。这些做法以个人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应该是可以存在的,但可怕的是,如果以国家权力的方式来全面推行的话,造成的结果有时就不能不是一种悲剧。所以,正义与邪恶之间有时确实很难区分,文艺作品如果还想有生命力的话,就不能不考虑到定义的标准与评价的尺度本身是否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

“元芳体”走红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在信息畅达的今天,语言传播与变异速度不断加快,各种网络流行体层出不穷。2012年10月,一种新的网络流行体——“元芳体”蹿红,在短时间里释放出强大的传播能量。“元芳体”来源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处理案件时常对手下李元芳说的一句话:“元芳,此事你怎么看?”其一般格式是在所叙述的事情或所表达的观点之后,加上一句“元芳,你怎么看?”网民往往针对社会热点、焦点事件发表意见,甚至对某些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表达质疑。

与“咆哮体”“甄嬛体”等其他盛行一时的网络流行体一样,“元芳体”走红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自身及社会因素。首先,根据模因理论,模因是一个文化传递的单位,语言中的模因实际上就是指那些存在于语言中的传递复制因子,它揭示了语言扩散传播的

规律。语言中的模因,把信息从一个人的记忆中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里,改变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着力模仿和宣扬这种模式。“元芳体”的传播正是这样一种模因复制传递现象。其次,“元芳体”互动性、参与性极强,体现了网民表达诉求、寻求共鸣的愿望,是人们释放情感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与“甄嬛体”等其他网络流行体相比,“元芳体”不具备仿写的功能,只是在所叙述事情或观点后附加一句“元芳,你怎么看?”这种模仿仿比较简单、机械,趣味性不强,不能满足网友求新、求变、求异的心理,发展前景恐不容乐观。“元芳体”或将消失,但很快会有新的网络流行体更迭出现,来满足新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对语言生活的新需求。

——毛力群、沈岑:《“元芳体”,你怎么看》(摘自2013年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字救国论

清末民初的汉字变革观源于一种启蒙观念的诉求。在汉字变革的倡导者们看来,汉字所具有的繁难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种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改革方案的传播与实施效果。由是,也就阻碍了开启民智、普及知识的启蒙教育。西方、日本通过语言文字改革所达成现代化的实例,成为语言文字改革者的镜鉴。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是在现代性焦虑的逼促下,出于启蒙的

考虑,汉字被剥去道体的神圣光环。这种以语言改革为进路,开启民智以达至国家富强的致思路径与实践模式,在晚清渐次展开的民族主义救亡与复兴运动中日益成为一种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字救国论》(摘自《南开学报》2013年第1期)

(哈宁/摘编)